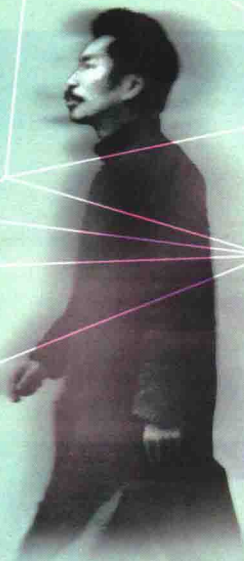


魯迅

現代轉型的
精神維度



汪衛東——著

魯迅

現代轉型的
精神維度

汪衛東——著

魯迅 ——現代轉型的精神維度

作 者 / 汪衛東
責任編輯 / 林千惠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蔡瑋筠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114內湖區舊宗路2段121巷19號（紅螞蟻資訊大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5年1月 BOD一版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5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魯迅：現代轉型的精神維度 / 汪衛東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5.1

面；公分

BOD版

ISBN 978-986-326-300-5 (平裝)

1. 周樹人 2. 傳記 3. 學術思想 4. 文學評論

782.884

103021413

目次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深度與限度：魯迅早期「個人」觀念 005

- 第一節 從「自我」到「個人」：
魯迅早期「個人」觀念的思想淵源 005
- 第二節 近代共同語境中的魯迅「個人」觀念 064
- 第三節 中、西比較語境中的魯迅「個人」觀念 106

002 | 第二章 邏輯與歷史：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147

- 第一節 作為思想形態的國民性批判 147
- 第二節 作為歷史觀念的國民性批判 170

003 | 第三章 文學主義與雜文意識 194

- 第一節 二十世紀的「文學主義」 194
- 第二節 雜文意識與文學行動 217

004 | 第四章 魯迅的兩次絕望 244

- 第一節 S會館的魯迅 244
- 第二節 1923年的魯迅 259

005 | 第五章 生命深淵的詩與思 288

第一節 《野草》：衝決絕望的行動 288

第二節 《野草》與佛教 315

006 | 第六章 變化的語境與魯迅的當代意義 356

第一節 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語境的變遷 356

第二節 魯迅的當下意義 369

後記 376

魯迅

現代轉型的
精神維度

汪衛東——著

目次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深度與限度：魯迅早期「個人」觀念 005

- 第一節 從「自我」到「個人」：
魯迅早期「個人」觀念的思想淵源 005
- 第二節 近代共同語境中的魯迅「個人」觀念 064
- 第三節 中、西比較語境中的魯迅「個人」觀念 106

002 | 第二章 邏輯與歷史：魯迅的國民性批判 147

- 第一節 作為思想形態的國民性批判 147
- 第二節 作為歷史觀念的國民性批判 170

003 | 第三章 文學主義與雜文意識 194

- 第一節 二十世紀的「文學主義」 194
- 第二節 雜文意識與文學行動 217

004 | 第四章 魯迅的兩次絕望 244

- 第一節 S會館的魯迅 244
- 第二節 1923年的魯迅 259

005 | 第五章 生命深淵的詩與思 288

第一節 《野草》：衝決絕望的行動 288

第二節 《野草》與佛教 315

006 | 第六章 變化的語境與魯迅的當代意義 356

第一節 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語境的變遷 356

第二節 魯迅的當下意義 369

後記 376

第一章 深度與限度： 魯迅早期「個人」觀念

第一節 從「自我」到「個人」： 魯迅早期「個人」觀念的思想淵源

一、「個人」、「精神」與「進化」：

魯迅日本時期文言論文的三個關鍵觀念

魯迅正式開始自己的言述生涯，是在日本時期，其間大約經歷了兩個寫作高峰。1903年頃，即剛到日本的第二年，年青的魯迅開始正式發表作品，在當時的留學生雜誌《浙江潮》上，他接連發表譯述《斯巴達之魂》、譯作法國雨果的隨筆《哀塵》（附所作譯後附記）、《說鈔》、合撰《中國地質略論》等，並出版了所譯法國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附所作《月界旅行》辨言）和《地底旅行》（後者首二回亦曾發表於《浙江潮》第十期）。這其中，創作和譯述難以截然兩分，這似乎並非魯迅之關心所在，但是，諸作品的寫作主題則不難看出，即科學和愛國。日本時期的另一個寫作高峰出現於1907、1908年，短短兩年，魯迅象排炮一樣打出長篇系列論文《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和

《破惡聲論》¹，均發表於留學生雜誌《河南》。在這兩個「高峰」期間，經歷了因失望於東京的中國留學生而遠離東京赴仙台學醫、由於仙台醫學課上幻燈片的刺激轉而回東京棄醫從文，以及棄醫從文的第一個計畫——《新生》文學雜誌——的流產這幾個著名事件²，這兩個魯迅後來一直耿耿於懷的人生經歷，對於正處於思想急變期的青年魯迅來說，應該具有關鍵的影響吧。這一點正在1907、08年的諸論文中反映出來，這組系列文章當然仍然貫穿著早期科學與愛國的主題，但是，與1903年文章明顯不同的是，這兩個主題已退居背後，被有關「人」（「個人」）、「精神」等主題所掩蓋，「個人」及其「精神」成為首要關注點³：《人之歷史》通過對西方進化論學說的學術史梳理，彰顯了在進化過程中生物自身的能動作用，在此基礎上，尤其強調人

¹ 1926年，魯迅把這幾篇論文收進他的第一本雜文集《墳》時，並沒有按當時發表的時間順序編排（按時間順序應是：《人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編後的次序是《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打亂時間順序的重新安排大概是從理路入手。

² 對這幾個著名事件的回顧，主要見於魯迅的《〈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

³ 這可從文章標題的擬定上可以看出，《人之歷史》起於介紹進化論的古希臘源頭，終於對「宇宙發生學」的企望，純然一極為客觀的學術史梳理，這從表像上直接承續了1903年科學論文系列的「科學」主題，但值得注意的是，論文的標題署為「人間之歷史」（初發表時名，收入《墳》時改為現名），並未出現作為關鍵字的「進化論」，進一步，從文章內容可以發現，通過描述而邏輯展開的梳理，其最終主旨並非在學術史本身，而是試圖通過學術史梳理追問人類發生、發展的歷史——「人之歷史」，故以海克爾的「人類發生學」為重心。可見，本篇的意圖不在學術史而在「人」的歷史，「人」取代「科學」（進化論）成為新的主題；同樣，《科學史教篇》以「科學史」為對象，而所重卻在「教」（科學發展史的教訓），以彰顯「科學」背後的「精神」因素。

在生物進化中「超乎群動」的「人類之能」。《科學史教篇》在對科學發展史的回溯中，追問科學發展的「真源」——科學背後的精神因素——「神思」、「理想」、「道德」、「聖覺」，揭示了「人類之能」的根源所在，並強調了科學——知識之外的人類精神需求的重要性。《文化偏至論》針對近世言新之士奉西方十九世紀「物質」和「眾數」的「偏至」文明為圭臬的傾向，鮮明地提出「立人」的主張：「是故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則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魯迅囑望於以施蒂納、尼采和易蔔生等為代表的西方十九世紀末「極端之個人主義」思潮，從其中的「主觀主義」及「意力主義」中拿來「個人」與「精神」，作為「興國」的「道術」，使「個人」成為系列論文的最強音。從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對「個人」的強調著眼於其蘊涵的精神創進的可能性，即「個人」作為實在就是內在性的精神，反之，「精神」的具體承擔者是以「個」為單位的「個人」，因而進一步把「精神」（「主觀」）落實到以「意力」為根基的「人格」上，總之，「個人」和「精神」相互涵涉，從而把「人類之能」的根基邏輯地落實到以「意力」為根基的以「個」為單位的「人格」之上。《摩羅詩力說》針對「詩人絕跡」、「心聲」隱默的中國精神現狀，強調「詩」——「心聲」對於民族興亡的重要性，通過輸入充滿「意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之「新聲」——「心聲」，以激起國人的「內曜」，以摩羅詩人的「詩力」激發國人心中本有之「詩」，並呼喚中國摩羅詩人的出現，以啟中國的「第二維新之聲」。《破惡聲論》痛感於「心聲內曜，兩不可期」的「寂漠」之境，呼喚國人之「白心」，通過

剖擊「破迷信」和「崇侵略」的「惡聲」，捍衛了精神信仰的重要性，彰顯了「人性」對於「獸性」、「奴性」的優越性，表達了魯迅的人性進化觀。從文本分析的內在理路可以看出，系列論文在「人類之能」、「神思」、「精神」、「意力」、「心聲」、「內曜」、「白心」、「人性」之「進化」等概念系統中，系統地表達了以「立人」為動機的「個人」觀念，「個人」，作為魯迅日本時期五篇文言論文的核心觀念，成為其重要的思想起點，實際上也成為貫穿他一生的重要思想因素。

通觀諸篇，可以看到，「個人」、「精神」和「進化」是五篇文言論文的核心觀念和基本命題，要全面統一地闡釋諸篇的諸多思想脈絡，發掘其思想蘊藏，尚須深入其中，加以進一步分析，在這三個觀念和命題的相互發明中，可能發現魯迅早期「個人」觀念的某些內涵。

（一）魯迅的進化論

在五篇文言論文中，魯迅形成並表達了自己的進化論思想。《人之歷史》在生物進化論的學術梳理中強調進化中生物自身的能動性，人在這一自然圖景中處在自然進化的高級階段，人之所以進化形成，正是因為其「超乎群動」的「人類之能」。魯迅在對進化論的梳理中一方面把人的源頭追溯至生物界甚至無生物界，在生物學視野中肯認了人類的自然性，同時通過對「人類之能」的強調，彰顯了人類超越於一般生物的「能」；在《科學史教篇》中，魯迅充分肯定科學的巨大成就，但他更重視科學背後的人的精神因素，以此為科學的「本根」，並強調人類文明不能以科學為終極。科學只是「人類之能」的成果顯現，而非其本

身，從他對科學的精神根源的再三強調看，其所謂「人類之能」直指此處所強調的「神思」、「理想」、「道德」、「聖覺」等精神因素；《文化偏至論》以「個人」——「精神」雙舉，著意於「精神」——「意力」的重要，在抨擊「物質主義」傾向時，並非以物質作為精神的對立，而是認為物質文明只是人類精神創造的成果，如果以此為本，則漠視了物質文明的創造性根源——精神，在魯迅的描述中，「文明之神旨」無疑指其後所提及的「精神」、「靈明」、「主觀之內面精神」和「性靈」，自此可以看到他對人類文明本質的理解，即文明的精髓是人的精神；在《破惡聲論》中，魯迅通過剖擊「破迷信」，繼續張主精神信仰的重要，通過剖擊「崇侵略」，劃分了「人性」與「獸性」、「奴性」的區別：中國自古「寶愛平和，天下鮮有」、「凡所自詡，乃在文明之光華美大」，「惡喋血，惡殺人，不忍別離，安於勞作，人之性則如是。」因而中國之「平和之性」應為人性的表現；「強大之邦」如「暴俄強德」「孤尊自國，蔑視異方，執進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異種悉為其臣仆不嫌也。」魯迅稱之為「獸性」；中國本為「平和之邦」，而中國之「崇侵略者」，不僅「崇強國」，而且「侮勝民」，則不僅「自反於獸性」，且墮落為「奴性」；在魯迅的表述中，「人性」是由「獸性」進化而來，故曰「獸性的遺留」，而「奴性」則為「人性」的墮落。魯迅這樣解釋「獸性」的由來：「人類顧由昉，乃在微生，自蟲蛆虎豹猿以至今日，古性伏中，時複顯露，於是有嗜殺戮侵略之事，奪土地子女玉帛以厭野心」，這無疑表達了其人類進化的譜系，即人是經由「微生」、「蟲蛆」、「虎豹」、「猿」進化而來，所謂「古性」，亦即「微生」性、

「蟲蛆」性、「虎豹」性和「猿」性，「獸性」的來源即在此「古性」之中。這裏，仍然如《人之歷史》把人放在生物進化論的視野之中，只不過認為人雖然進化為人，由於進化的不完全，仍遺留為人之前的「古性」，因而說：「夫人曆進化之道途，其度則大有差等，或留蛆蟲性，或猿狙性，縱越萬祀，不能大同。」魯迅意識到，人類進化的程度不同，而且永遠也不能「大同」，因而，一方面，他在自然進化的層面並不完全否定「人性」所經由的「獸性」，從抨擊「崇強國，侮勝民」的中國「志士」的「奴性」，把「奴性」放在「獸性」之下，可以看出，「獸性」只是「人性」進化的尚未完全，而「奴性」是「人性」的扭曲、倒退和墮落，中國人本屬「平和之民」，中國「志士」的「崇侵略」表現的是「崇強國，侮勝民」的奴性的二重人格；另一方面，魯迅在分析「侵略」之性時，對於人類的「平和」之性大加推崇，他認為「古民惟群，後乃成國，分畫疆界，生長於斯，使其用天之宜，食地之利，借自力以善生事，揖睦而不相攻，此蓋至善，亦非不能也。」「平和」為人類初始的理想狀況，亦是可以達到的「至善」目標；對於中國人固有的「平和」之性，魯迅甚至趨於理想化的描述（見上所引），並認為「人之性則如是」；而中國「崇侵略」之「志士」，則是「舊性失，同情漓」，此「舊性」即中國固有之「平和」之性。由此可見，魯迅在不滿於「獸性」的基礎上，寄望於真正「人性」的形成。後來，魯迅說：「人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⁴說明基於人性進化的事實，他寄望於人性在生物進化基礎上的進

⁴ 魯迅：《熱風·隨感錄六十一不滿》，《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358頁。

一步進化。這裏對「平和」之性的推崇，與《摩羅詩力說》中對「平和」之性的否定，似乎構成了矛盾。《摩羅詩力說》認為，摩羅詩人「最雄桀偉美」之「心聲」，不能「語以平和之民」，並認為「平和為物，不見於人間。其強謂之平和者，不過戰事方已或未始之時，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殺機自昉，與有生偕，平和之名，等於無有。」「平和」不能實現於人間。「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戰鬥，漸進於文明矣，化定俗移，轉為新懦，知前征之至險，則爽然思歸其雌」，「生民」之「戰鬥」得到肯定，「文明人」之「平和」則為「新懦」，「而戰場在前，複自知不可避，於是運其神思，創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區，或遲之不可計年以後。自柏拉圖（Platon）《邦國論》始，西方哲士，作此念者不知幾何人。雖自古迄今，絕無此平和之朕，而引頸方來，神思所慕之儀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間進化之一分子歟？」對未來「平和」之境的想像，既是對「戰場」的逃避，但也不否定它對人類進化的引導作用；「奈何星氣既凝，人類既出而後，無時無物，不稟殺機，進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肯定生物進化的實際狀況是生物間的生存競爭——「戰鬥」，因此所謂「平和」是不存在的，只能是理想，但既然「戰鬥」是事實，為何又承認「理想之邦」——「平和」之境可為「人間進化之一因數」？這無疑在直面事實的同時，指向了事實之外的價值。可以這樣來理解，魯迅在自己的文明構想中，反對「侵略」之「獸性」和「奴性」，並給出了「平和」之「人性」的重要性，在直面近代中國「爭存」於世界的弱者處境時，否定了「平和」的現實性。